

我国农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编写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编写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5 字数 52,000

1977年9月第1版 1977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71·327 定价: 0.22元

前 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主要是贫下中农，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他们都起着伟大的作用。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对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路。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以后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期间，毛主席先后发表的许多著作中，都一再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

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新民主主义论》），“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论联合政府》）

历史证明，毛主席的理论是无比正确的。民主革命时期，在我党领导下的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岁月里，我国广大农民，为了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伟大力量。在北伐战争失败之后，湘赣边界的农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参加了秋收起义，开始向井冈山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并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农民更是不惜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为打败凶恶的日本侵略者，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和广大农民的贡献分不开的。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仍然把农民问题作为一个极大的问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家知道，我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就同农民结成了巩固的联盟。当时，

这个联盟主要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的基础之上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经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封建所有制已经被消灭，农民已经从封建所有制中解放出来了，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就要“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只有把农民引上合作化的道路，工农联盟才能新的基础上获得巩固。历史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无比英明正确的。我国广大农民，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并没有停止革命，他们在党的领导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土改胜利的基础上，趁热打铁，乘胜前进，迅速地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实现了由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革命转变，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开始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这就进一步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农业合作化的完成，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在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土地

改革以后，围绕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反复尖锐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战胜了他们的干扰和破坏，取得了农业合作化的伟大胜利，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继续向前发展。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回顾农业合作化运动，重温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于我们加深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坚持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在这本书里，我们将对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以及围绕着我国农业合作化问题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作一个概略的介绍。

目 录

一	尖锐的矛盾·····	(1)
二	必由之路·····	(20)
三	逐步前进·····	(42)
四	决战的一年·····	(64)
五	伟大的胜利·····	(80)
六	还有战斗在后头·····	(96)

一 尖锐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不久，一场伟大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其势如暴风骤雨，锐不可挡。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这场运动仅仅经过近三年的时间，到一九五二年底，除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以外，就已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的胜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它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摧毁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实行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全国新老解放区约有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批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并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的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就原华东区来说，全区农民分得的土地就有一亿二千一百余万亩，占原华东区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一般贫雇农平均每人分到一亩三分至二亩，中农一般平均每人分到一亩至一

亩五分。此外，全区农民还得到耕牛约五十余万头，农具约九百八十余件。土地改革的完成，使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九五二年全区农村购买力比一九五一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一。

土地改革，使农民和土地，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了。广大农民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这一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调动和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五二年和一九四九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二点八，棉花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点四。总之，土地改革，对于解放初期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工农联盟的巩固，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土地改革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张。毛主席早就指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论联合政府》）党领导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是为了继续领导农民过渡到社会主义。用社会

主义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是广大农民彻底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因此，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把农村引向社会主义。

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无疑是反对社会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就以个体农民说来，它也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阶级，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作为劳动者，他们的根本利益和无产阶级是一致的，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这是基本的和主要的，也是本质的方面。但是，作为私有者，他们又具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尽管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不同，私有观念程度也不一样，这种倾向是不同程度存在的。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产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尖锐矛盾和斗争。从湖南省平江县老贫农向占梅在土改后所走过的一段弯路，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思想怎样象枷锁一样束缚着作为私有者的个体农民。

向占梅一家，在解放以前，生活极其贫困。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他分得了土地、房屋、家具等，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翻了身，生活慢慢地好了起来，过上了中农的生活，并且有了剩余。在刘少奇推行“保护富农经济”、“发家致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农村资本主义经济的诱惑下，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也开始冒了出来。他想“矮子上楼梯”“步步高升”，爬上雇工剥削的富农地位。一九五一年，他把余下的粮食买了一百一十多斤棉纱，十多斤颜料，开始织青布，经营起赚钱的买卖。以后，就用卖布的钱去买青苗。当年夏荒时节，他用一个布换一石八斗新谷的办法，在沅江草尾一带放了三十个布的债。当时一个青布价格是五元，而一石八斗新谷价格是九元二角，这样，一个布就获利四元二角，几乎赚了人家一倍的钱。随着余粮余款的增多，向占梅“发家致富”的思想也越来越浓。一九五二年，他除了拿青布去放新谷债外，又用四只小猪放了十五石新谷债，一头小牛放了四百二十斤新谷债。这样，到秋后，一共收回了三十石新谷债。家底厚了，本钱多了，他并不满足，还想富了更富，便又产生了发大财的念头，想既不用自己劳动，又能吃好穿好，过舒适安逸的生活。于是，他准备买田买地雇长工，过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一九五三年秋后，他准备把贫农余胜田等

五户的四十石毛谷用一起买进来，当时一切都已商量停当，只等写契约了。同时他还在打算从一九五四年起雇长工种地。正当向占梅一步一步走向地主资产阶级的时侯，一九五三年年底，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了。通过大张旗鼓的总路线宣传教育运动，才把这个贫农兄弟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挽救回来。

从这个惊心动魄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生产自发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一些贫下中农身上表现得尚且这样强烈，那末在富裕中农的身上，就必然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加大量，更加严重。富裕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力量比较强，他们的私有观念就更浓厚一些。他们是典型的小私有者，他们中间的有一些人还有轻微的剥削行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接近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因此，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更为严重。他们十分向往富农的经济地位，总想在别人贫困的基础上，更多地积累自己的财富，爬上农村资产阶级的地位，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里，我们可以再举一个山西省解虞县阎家村富裕中农关风德的例子来看一看。关风德一心想“发家致富”，看到高利贷是赚大利、发大财的好门路，便依仗自己有较强的经济力量，用余粮余款大放高利贷，从事资本主义剥削活动。他每年放出的粮款约值五十多

石麦子，而且利率很高，每石月利就要五斗至七斗。当时全村就有三十多个困难户，受到他这种高利贷的盘剥。这样，自土改后到一九五五年，在连年放高利贷的基础上，使他大发横财，很快用贫苦农民的血汗养肥了自己，上升成为新富农，爬上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地位。

以上这些例子，充分地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不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任其自由发展，势必导致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

列宁说：“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小农经济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它必然要向两极分化。我们知道，在商品货币关系下，个体农民不得不依存于商业，依存于信贷。个体农民往往要出卖一部分或大部分产品。所以，个体农业经济是一种小商品经济，这种小商品经济虽然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着原则的区别，但是从它建筑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点上看，它和资本主义经济是同一类型。由于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当商品经济不断渗入农村之后，小农经济也要受到价值规律以及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等经济规律的支配，这样，就打破了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某

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同时，由于小农经济生产单位极其分散和狭小，力量单薄，既落后又脆弱，一旦遇到生产或生活开支周转不灵，或遇上天灾人祸的时候，它就要借债，或出卖土地，甚至破产。这样一来，农村的阶级分化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大多数农民贫困破产，沦为雇农，而少数人则发展成为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

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从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的情况来看，在土改以后短短几年间，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的严重趋势。一些有严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农民，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仗着家底厚、资金多，生产资料充足等条件，放肆地大搞资本主义活动，用剥削广大贫苦农民血汗的办法来发家致富。他们有的买了牲口、大车，搞投机买卖，拉脚跑运输，从中牟利；有的赶着三头牛，带着犁杖，在村内外“卖套”赚粮食，拉一天套就要一斗至二斗粮食，还得好吃好喝好招待；有的放起了高利贷，收取年利三分甚至更高的利息；有的公开地或者变相地雇佣长工短工，进行雇工剥削；有的还想方设法买进或典进土地、房屋，并竭力压低地价。他们在侵吞贫苦农民劳动成果的基础上，盖了房，买了地，添了大牲口，置了大农具，过着囤里有存粮，地里有雇工，手里有

现款，外边放有高利贷的剥削生活。土改后，短短两年，全村上升到富裕中农的就有十六户。这个数字占到中农、贫雇农总户数一百四十五户的百分之十一。

这个村有一个曾经混进革命队伍名叫杜奎的人，表现尤其恶劣。杜奎抱着“捞一把”的思想参加革命，在革命胜利后，发家致富的思想恶性发展。他用贪污八路军军粮军款的钱，用敲诈勒索贫下中农弄来的钱，以及从接受地主富农贿赂得来的钱，在土改后的两年间，就置了十五亩地、四头牛、半头驴，他还以换房为名，连蒙带骗，巧取豪夺地把贫农刘宝山的三间房屋和一亩多房前地霸占了去，很快成了西铺村的一个暴发户。有发财的，必然会有破产的。该村的广大贫苦农民，虽然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是由于家底很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 and 资金非常缺少，在生产和生活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的袭击，就会有的典房，有的卖地，有的扛活，有的要饭，甚至闹得毁家破产。一九四九年发生在沙河的一次洪水泛滥，冲毁了西铺的九十多亩耕地和十四间房屋。在这次水灾中，贫农王荣，因为在土改中分得的十一亩地被冲毁了四、五亩，生活发生困难，被迫只好让自己的儿子去给人家当长工。贫农戴存，在土改后不久，父母相继病死，留下了他和四个妹妹，还留下了一

屁股债。当时戴存才十三岁，几个妹妹年纪更小，家里
有地无力耕种，只得把土改分到的三间房，十一亩地重
新典当出去，还了帐，埋了双亲，含着泪把大妹妹童养
出去，把另外三个妹妹送给了别人。自己过着讨饭的
流浪生活。

尽管当时国家每年都发放大量的救济粮和救济
款，但西铺自上改后到一九五二年的短短几年间，仍然
有十一户贫下中农卖出土地和典出土地七十四亩，有
六户典出房屋十五间；同时有一百多户缺粮，其中严重
缺粮的七十四户；有六十多户欠债。贫农王生等四户
又被逼出去讨饭，至于扛活打短工的就更多了。

西铺的情况，只不过是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村两
极分化的一个缩影。这种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必然发生
的阶级分化的现象，在全国各地到处可以看到。据一
九五二年山西省忻县地委对一百四十三个村的调查，
一九四九年以后，有八千二百五十三户农民出卖土地
三万九千九百一十二亩，出卖房屋五千一百六十二间。
出卖土地、房屋的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九点五。由
于出卖土地房屋，一部分农民的成分已经下降。静乐
县五区（老区）十九个村五千七百五十八户人家中，就
有八百八十户农民卖地，造成一百六十七户老中农因
出卖土地下降为贫农，四百七十一户土改中分到土地